

相恋一别 70 载， 她用整整一生寻找他

文：丑丑

那一年，我们正热恋

1948年，我，徐婉婵，21岁，就读于浙江省立杭州高等职业医事学院（现在的杭州医学院）。他25岁，是笕桥中央航校第25期学员。那一年，我们正在热恋，同学们都羡慕我有一个飞行员男朋友。他本名王振康，学名王斌，他让我叫他“振康”。他每周给我写一次信，周六、周日则会开着吉普车从笕桥来学校看我。

这年12月15日，是一个我至死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后来我才想起这天不是周末，振康突然急匆匆到宿舍来找我，我们像往常一样到西湖边散步。此时的振康，和往日有些不同，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他告诉我，笕桥中央航校紧急迁往台湾，他要随部队换防。

他说：“婉婵，我们结婚吧，和我一起回去台湾。”

天真的我根本不知道时局变化：“我还有半年就毕业了，毕业后我就随你去台湾结婚。”

看他一脸凝重，我想逗他开心：“你是天之骄子，要开心。”

“我不是天子骄子，飞行员命都不长。婉婵，我担心有一天留你一人独活世上。”

我有点生气，当即捂住他的嘴不许他说下去。

于是，振康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贺卡递给我，贺卡封面是蓝色的天空背景中，一条金色的龙腾云盘旋，就像驾着战机翱翔蓝天的他。贺卡空白处，他用钢笔写下：“祝您新年快乐，前途幸福，谨以此赠给我想念中的人儿！振康敬赠一九四八年



21岁，我穿上了护师服

十二月十五日”。

这是我们恋爱以来第一次分别，此后我用整整一生来寻找他。这张贺卡是他留给我最后的信物，我一直保存着，无论生活遇到多大变故，都没舍得丢弃。

一见钟情定婚约

我和振康相识是因为偶遇。

1947年10月31日，杭州各高校在杭州体育场组织了一场体育联赛。我身高1.75米，作为学校女排队员参赛。排球赛进行到一半，却突然下起了大雨，不得不中断，我和同学赶紧跑到主席台躲雨。

我正转身找同学要手帕擦拭被雨淋湿的球衣，一回头，就撞到一双炽热的眼睛，这双眼睛的主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他穿着篮球运动服，身材挺拔，国字脸，浓眉大眼，他的眼睛漆黑深邃，真好看啊！

我脸一红，对他笑笑，他也一下脸红了，回报我一个微笑后，赶紧挪开了眼神。

第二天是周六，我在宿舍休息，同学跑来说有三个空军飞行员找我。见我下楼来，三个

人都抬头看着我笑。其中一人特别腼腆，看到我脸就红了。我马上认出来，他就是头一天在体育场主席台上遇见，但没说过话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名字，后来也没问过他。

振康家里经商，定居合肥，抗战前他就读南京金陵大学哲学系。1944年，为响应“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振康投笔从戎，在成都报名参军，随后参加远征军，奔赴印缅战场。抗战胜利后，他没再回到金陵大学继续学业，而是考入笕桥中央航校（其时已改名为空军军官学校），成为航校第25期学员。

我俩认识后，每周六日都会一起看电影、爬山、荡舟、骑脚踏车围着西湖转。逛饿了，他就请我吃西湖藕粉、麻球王、小鸡酥……他性格温和内向，热烈的情话说不出口，但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认定，这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

有一天，我们泛舟西湖。振康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有一天，我们不小心走散了。你一定要记得，就在岳坟前等，不见不散。最多10年，我们一定会重聚。”我觉得很好笑，好好的，怎么会走散呢？直到很久以后，当我想起这句话，才理解他当时心里的担忧。

我们各自写信回家坦陈恋情。1948年上半年，振康去南京执行任务回来，带了一枚金戒指和一支派克金笔送给我。戒面方方正正，上刻一个“福”字。

虽未举行结婚仪式，但在双方家人眼里，我们已经不仅是恋人，而是未婚夫妻。

当恋情成了“罪证”

1948年12月15日之后，振康再也没有

来看我，一周一封信也没有了。我穿着他送给我的大衣，跑到笕桥去找他，但空空荡荡的校园已是一片死寂。我常常到岳坟去，一坐一整天，再也看不到那个穿着绿色军装的人挤出人群，满面笑容地向我跑来。一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飞行员命都不长”，我就心疼得不能呼吸。

一次，我失魂落魄地走到西湖边，见有算命先生在等生意，便报上了振康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给了我10个字：人还活着，远在天涯海角。

一听他这样说，我就哭了，但转念一想，心里又燃起一丝希望。只要他还活着，无论身在天涯海角，就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这一年的寒假，我过得犹如失去灵魂一般，每天以泪洗面。

解放军一路南下，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1949年4月，我正心急如焚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振康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看得出来，这封信写得非常匆忙，他让我尽快过去，

还附了一个地址：台湾屏东机场，空军第十一大队第四十四中队。

命运总是弄人。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5月3日，杭州解放。我只能确信，振康去了台湾，还活着。只要他活着，我就知足了。

1950年，母亲从老家来信。信中说，振康的弟弟振业参加了解放军，随南下解放舟山的部队，经过临海，宿营赤水村。振业找到她，打听哥哥振康的下落。他以为，我一定知道振康的行踪。

振业给母亲留下了合肥家里的地址：赵千户巷1号。然后，他又匆匆跟随部队开拔了。振业说，等打完仗，他还会再回来找我们，打听哥哥的消息。

放下信后，我立即上街去买了两块丝绸布料和一块被面，寄到合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安慰振康家人，表达自己的牵挂。然而，



分别70年后，终于得到振康这张当年的戎装照，而我已年过耄耋

我寄出去的丝绸如石沉大海，说好打完仗后就会回来的振业也再无消息，不知生死。

不久，医院改制发给大家一张表格，要求所有解放前参加工作的人员如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我便在表格上写下：我的未婚夫王斌为笕桥航校飞行员。从此，“未婚夫为台湾空军飞行员”，成了档案中跟随我一生的污点。当年，振康驾机飞到医院上空盘旋问候我的场面，则成了我作为反革命家属的“罪证”。

1952年，医院的“打虎队”将我关押起来，说我贪污巨额公款，将公款通过未婚夫转移到台湾，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几天逼供折磨，我的身心受到巨大创伤，完全崩溃，只得签字承认了这项强加的罪名。

而我临海赤水村的老家也被评为“地主”成分，家里的房产财产、田地通通被没收，母亲一夜之间戴上了“地主婆”的帽子，天天被批斗。

苦难接踵而至

我决定把自己嫁了。他和王振康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叫王耀振。他毕业于浙江医学院，和我同时分配到建德省立第三康复医院。后来，我们又一起调到诸暨的浙江省第一康复医院（后改称诸暨人民医院），他是胸外科主任，我是护师。

耀振性子刚直，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偏偏对我温柔体贴，处处都照顾我。我将与振康的往事都告诉了他，并坦承自己这一生都忘不了振康。耀振表示完全理解，也接受我心里一直为振康留一块位置。

1953年，我和耀振结婚。接着，三个女儿陆续降生。

振康曾送我一本暗红色的相册，里面有许多我们在一起时拍的照片。空闲时，我会翻开相册，给孩子们讲照片里的故事。耀振在旁边静静地听，默默地凝望我，听到有趣处，也会跟着笑。他是一个心胸像大海一样广阔



1953年，我和耀振结婚了

的男人。我很幸运，此生被两个如此优秀的男人爱过。

生活忙碌而艰辛，我把振康送我的派克金笔、绸扇、檀香皂、贺卡、照片装进铁盒子锁入柜子。我以为，不再日夜思念振康后，我的生活就会慢慢平静。殊不知，苦难才刚刚开始。

1958年，耀振部门的一个护士去上级部门开结婚介绍信，该部门领导想强暴她，未遂。她逃出来，哭着跑去找耀振倾诉。正直的他火冒三丈，在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向那个领导提了意见。

第二天，医院便贴满了针对耀振的大字报，他被打成“右派”，先送往原籍宁海长街，后又调到宁夏盐池劳改。一个江南文弱书生，在那西北苦寒之地，受尽折磨。

耀振走的时候，大女儿还不满5岁。单位领导不断找我谈话，让我和丈夫离婚，划清界限。我坚决不肯，他是冤枉的，被人陷害，我不能离开他。

1966年，在宁夏劳改8年后，耀振又被遣送回宁海长街农村。我随后调往宁海人民医院。每隔半个月，我会带着孩子们到乡下去和他团聚一次。

1979年，全国性纠正错划“右派”，宁海县组织部门的工作人员到诸暨查阅档案，发现根本没有关于将耀振打成“右派”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任何相关文件。耀振这21年的磨难，全因那个领导的口头认定，公报私仇。耀振终于得到平反，恢复工作，回到诸暨上班。

这时候，耀振已经54岁了，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了，他最好的执业生涯已蹉跎。

心碎情长泪未干

1981年，我退休了，含饴弄孙，忙碌充实。2008年，外孙们都长大了，我和耀振选择住进了养老院。自2000年以来，海峡两岸往来渐趋频繁，我又慢慢想起了振康，想起那些过往，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常常要靠安眠药助眠。耀振知道我的心病，总是陪着我，安慰我。

因为思郁过度，我患上了抑郁症，越来越消瘦。耀振便让孩子们一定想办法打听振康的消息。

终于，2015年年初，二女儿一封寄往台湾的信有了回音。因我患有眼疾多年，看不清字迹，就由耀振将来信念给我听：经查，我前空军飞行员王斌（改名王易斌），于1955年9月20日因驾机参加演习失事，为国殉职，英烈留芳。

听完后，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1955年，振康32岁，他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年龄。我原想，等老了，到了天上，我们总是会相聚的。如今，我成了老姬，而我一生思念的他却芳华永驻。他，不会再认得我了。

耀振看着我说：“你怎么不哭呀，心肠这样硬？”他不知道，人真正悲伤到绝望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只是心碎了，碎成一片一片，碎成了渣。

没想到，半年后，耀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想起他历经坎坷的一生，以及他对我的包容和呵护，我再一次心如刀绞。

我患抑郁症后，女儿常带我去医院看病拿药。耀振总是一个人坐在养老院的门口，望着路口眼巴巴地等我回来。车子开到他身边停下，他便会立即迎上前来，兴奋得就像个孩子。

他默默守护我一生，他的爱，我这一生

都难以报答。

女儿曾问我：“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爸爸？”我告诉她：“我当然是爱你们父亲的，否则那时早就和他划清界限，不会和他相守60余年，但我也爱振康，这是两种不一样的爱。”

如今，两个深爱我的男人都已离去，独留我活在世上。

女儿们很孝顺，一直在四处求助寻找，希望帮我找到一张振康的照片。2018年8月，在抗日名将孔庸之孙孔柏年先生和抗战空军烈士陈怀民的侄孙陈功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如愿得到了振康的照片。

拿到照片的那一刻，我瞬间呆在那里。振康，我思念了近70年的爱人，他还是旧时的模样，一身戎装，英俊帅气。我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照片，70年前的影像一幕幕从眼前闪过，不禁老泪纵横。他说过，不离不弃，不见不散。

一旁的女儿惊呼：“妈妈，你流泪了呀！”20年了，我因为泪腺堵塞，早已泪竭。可是那一刻，我的眼泪居然直流而下，仿佛怎么都流不完。

随后的几天，我知道了振康更多的信息。

当年台湾当局为避免空军飞行员驾机投诚大陆，要求他们必须在台湾结婚，否则禁飞。在巨大的压力下，振康和军队文工团一名赵姓女子成婚，育有一儿一女。

这个信息最让我宽慰。振康的亲人都在大陆，我总担心他在台湾孤苦伶仃，无人照顾。

失去音信近70年后，突然知道了振康的情况，那几天总让我感觉像在做梦，我反复问女儿：“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白天，我拿着振康的照片一遍遍端详，对他说话。晚上睡觉，我就把他的照片放在枕头下面。

2018年9月3日，台湾志愿者陈刚先生在台北碧潭空军公墓找到了振康的墓碑，并帮我献上一束玫瑰。事后，我看到了他从台湾传来的照片，很欣慰。☺